

仪式：口语社会中传播的社会化功能的集中体现

高巍华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在口语社会中，传播担负着对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功能。本文试图通过对口语社会中仪式的三个要件的传播特点及其在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仪式在口语社会中社会化功能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口语社会 仪式 社会化 图腾 史诗 行为范式

按照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与社会形态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那么人类社会可以被分为口语媒介（部落社会）时代、文字印刷媒介（脱部落社会）时代、电子媒介（地球村）时代。而本文所谓的口语社会即麦克卢汉所提到的第一个时代——处在人类发明语言却还没有掌握文字的这一阶段。在口语社会中，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当然就是口语，但一些非语言的传播形式在口语社会中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非语言传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身体动作/身势行为（2）触摸（3）外表与饰品（4）副语言（5）空间语（6）时间语（7）环境因素。”^①非语言传播和口语传播共同构成了口语社会中的传播的主要媒介。当时人类的传播活动是由于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关系中对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的需要。传播活动对社会关系的维护与促进，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传播的社会化功能。美国学者 C.R 赖特在 1959 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将大众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社会化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口语社会中，传播——虽然不是如今所谓的大众传播——同样也担负着对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功能。

“仪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因而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点领域。”（薛艺兵 2003）仪式在口语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社会学者涂尔干认为，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通过这一手段，使人们‘感到他们团结了起来’，并且‘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道德统一’，仪式使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②在人类学意义上，仪式是由社会成员或者专门人员参与的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传统性的、程式化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我们可以认为仪式是一种组织传播形式，或者更广义上是一种大众传播形式。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和社会关系不断复杂，仪式不仅仅针对的是氏族组织内部成员，也更进一步扩大的到部落联盟内、具有国家雏形的城邦内的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分散各地，互不认识的为数众多”的大众。因此，可以说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大众传播活动，“因为不同的传播者其实是循着同一传统习惯传播着同一种价值观念。”^③

我们可以把仪式也作为大众传播形式。仪式这种传播形式显然也承担了对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功能。同时，因为仪式

整合了口语传播和非语言传播，把它们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而成为范式，赋予特定的传播内容，并且和社会成员产生互动。这样，仪式在口语社会中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社会化力量。

本文试图通过对口语社会中仪式的三个要件传播特点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仪式在口语社会中社会化功能的独特作用。

在口语社会中，仪式一般由三个要件构成：“图腾”、“史诗”和“行为范式”。

一、图腾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的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一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物、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④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

在口语社会中，人们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猛兽天灾随时威胁着人的生命。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只能结合在一起，同大自然对抗。个人必须与他所属的集体融为一体。图腾是口语时代人们群体的主体意识发展的一个标志，图腾意识是群体成员的共同意识，是群体的粘合剂。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首先就是认同他所在的群体，认同群体共享的意识和信仰，才能获得群体的认可，才能融入这个群体。

在口语社会中，最初的仪式大多是氏族祭拜图腾的活动。整个氏族的成员都参与到祭拜仪式中，此时图腾是整个仪式的中心。通过不断祭拜的仪式，所有氏族成员对图腾以及它所包含的图腾意义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再确认，仪式成为氏族新成员的催化剂，促使他们快速地认同群体。据记载，有人为澳洲南部阿龙太人拍摄了一张照片，递给他看时所得到的反应是：“那人和我一样，也是袋鼠。”^⑤图腾（袋鼠）成了阿龙太人对群体认同的第一个可感知的形式。随着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扩大，图腾不再仅仅成为一个靠血缘关系结合的氏族的独特标志。氏族与氏族之间的融合，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融合，图腾也越来越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中国的图腾“龙”就是由蛇加上各种动物形成的，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同其他氏族部落融合的过程。这时，图腾依然是仪式的核心，但它不如当初那么明显了，它逐步变成仪式的“背景”。人们举行这一仪式的前提是对这个“背景”的认同，具体的仪式内容如成年礼、婚礼、葬礼等都是建构在这一“背景”中的。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就是大写的图腾。至此，仪式这种传播形式暗示这种图腾的文化观，由此来整合广大的社会，实现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认识。

因此,我们说图腾是仪式的核心,仪式中所有运用到的手段都是为这个“图腾”服务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仪式这种传播形式所传递的是包含社会整合内涵的图腾的信息。图腾是传者和受者共通的意义空间。在仪式中,传者和受者交换着图腾的意义并达成共识,共识达成的过程当然也是社会成员社会化的过程。在口语社会中,“图腾”帮助社会成员回答了“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

二、史诗

今人是如何知道文字产生之前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呢?除了考古得到的资料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流传至今的“史诗”了解那时的情况。如今我们很多时候是把史诗当做文学作品来看的,可在口语社会,史诗却是承载整个社会历史和教化的重要传播工具。远古时代,每个仪式进行时必不可少的就是对整个群体或社会的历史予以追溯和歌颂,在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情况下,史诗传播便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时候,氏族的老者所做的史诗传播活动其本身就成为一种仪式。

史诗传播完全是口口相传的口语传播,其本身在社会成员社会化方面具有三个特点:

(一)史诗的内容是世代延续的传统,史诗中描述的故事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在这种传统的规范下,人们自觉地按照史诗所描述的社会传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and 态度。在刘向《列女传》第一卷《母仪传》“周室之母”记载:“古者妇人妊子……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瞽人是古代乐师,所谓“道正事”,就是乐师吟唱这个社会的传统和历史的“史诗”。这一段描述的就是一种仪式,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给他宣讲“正事”,期望他能“形容端正”、“才德过人”。从这一例子看来,当时人们是很注重通过史诗传播对新的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教育。除了对社会历史传统的描述外,史诗的内容有一部分是人们世代以来的生存经验的总结。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之类的格言警句。^⑥这方面内容对新的社会成员起到了教育和传递知识的作用。

(二)史诗的形式中含有大量的固定的套语和标准化的议题,比如荷马史诗中就似乎有很多陈词滥调:议事会、调兵遣将、对垒叫阵、对战败者的掠夺、英雄的盾牌等等。^⑦同时也存在大量冗余或“丰裕”的内容。这样做,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克服口语在传播过程的损耗。口语交际的特点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仅依靠一次、两次的交流就达到理解和记忆的目的。史诗中必要的冗余和重复使得受者不断地回顾反思,从而增加了互动次数。另一方面,由于完全没有固化在纸上的文字,那么语法、语格等只存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口语交流中。史诗中存在固定的套语对新的社会成员所掌握的语言起到了纠正和示范作用,帮助新的社会成员与其他成员顺利进行口语交流。

(三)在仪式上,史诗的传播过程存在着“召唤—回应”模式。它是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受者疏离的。受者参与时的反应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集体的、趋同的参与。表现为:人们常常全身心地参与集体的交流活动,共同或是浅唱低吟、或是高歌唱和、或是呐喊助威、或是鼓掌欢呼。^⑧

按照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来看,仪式中的史诗传播,主要目的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在口语社会社会成员社会化过程中,“史诗”帮助社会成员解决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

三、“行为范式”

仪式中的“行为范式”是指仪式中所固化的具有象征性、

表演性、程式性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并且也包括仪式参与者在这些行为中的角色地位。仪式中的“行为范式”在口语社会社会成员社会化过程中,着力于解决“我们该怎样做”的问题。早期仪式中的跪拜、鞠躬、挥手等行为为的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际关系。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化,如出现了阶级、国家等等,人际之间也通过这样的固化行为来确定相互的角色地位。仪式中这些固化的行为活动就逐渐演化而成为后世的“礼仪”。“礼仪”不仅仅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工具,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工具。

通过仪式的“行为范式”,让整个社会的成员认识到了“我们该怎么做”,新的社会成员也在参与仪式的活动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及行为导向。

综上所述,在口语社会中,以图腾为核心、史诗为重要组成部分、行为范式为表现形态的仪式是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形式。在没有电视、广播、报纸、书籍的时代,这种大众传播形式在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别的传播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注 释:

王晓晖、韩雪峰:《口语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当代传播》2007(4) P.33

②[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P.507

③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7卷1期

④王曰美:《原始社会人的主体意识之觉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 P.92~93

⑤李景源:《史前认识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P.269

⑥何道宽:《破解史诗和口头传统之谜——〈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评析》,《南方文坛》2008(02) P.28

⑦Walter J Ong,Orality and literacy: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M].Methuen Co.Ltd,1983 P.23

⑧何道宽:《破解史诗和口头传统之谜——〈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评析》,《南方文坛》,《J》2008(02) P.28

参考文献:

- 1、曾丽君:《中国文学早期的口头传播方式与叙事传统》,《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卷第4期
- 2、方轩:《浅谈传播媒介的演变对文学的影响》,《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年9月第3卷第3期
- 3、姚锡远:《论口语交际的社会功能及其特征》,《天中学刊》,1995年2月第1卷第1期
- 4、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三个模式》,《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04期
- 5、李明伟:《长幼无间:口头传播与口语社会的社会化》,《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月第9卷第3期
- 6、宁登国、赵立伟:《先秦口头传播与“事语”类史料的形成》,《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04期
- 7、张兵娟:《仪式传播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03期
- 8、彭贵川:《论口语交际中语言信息传播损耗因素及其控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0期
- 9、范小平:《甲骨文图腾符号和残留于青铜器的图腾艺术对应现象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05期